

◀ (上接13版)

气的长袍。元朝的航海政策促成了有史以来中印两国之间最大的贸易额,印度也向元朝和中东地区的蒙古伊尔汗国之间主要的海运连接点开放了港口。在与霍尔木兹海峡和其他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元朝购得了宝石、药材、胡椒、豆蔻等香料,出口的货物则包括丝绸、陶瓷和铜币。同样重要的是,元朝皇帝可以由此与蒙古帝国的另一块领土——伊尔汗国保持联络。元朝和中亚的敌对关系有时阻断了陆路贸易,这是元朝进行海洋贸易的另一个动因。元朝被迫去探索和扩大海上贸易,海上贸易的成功也带来了商业税收的水涨船高,商业税从1272年的4000两白银增加到了1286年的450000两白银。大多数参与贸易的船舰来自波斯、阿拉伯大陆、东南亚和印度。

不过,中国的船舶也加入了海外贸易。最近发掘出来的几艘沉船为这场贸易的规模庞大程度提供了线索。一艘开往日本的船在朝鲜海岸附近沉没,船上装载有数以万计的瓷器。这场贸易的利润最终推动了船舶建造,一些“远洋游轮设有上等客房和酒行……结构坚固,舱壁密封性强,其中较大的

游轮还配有救生艇”。另外,居住在中国东南部的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社群非常友好,他们提供了很多关于旅游和贸易的建议与信息。

明朝穆斯林宦官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名气盖过了元朝的海上贸易,郑和在1405年到1432年期间率领船队和数千名船员进行了七次航行,他带领的出色使团一直抵达了非洲东海岸,郑和的卓越成就抢走了元朝航海成就的风头。然而,元朝的海上贸易规模庞大,其经济意义甚至可能比陆上丝绸之路还要大。无论蒙古人是如何声称或认为的,基于海上联络的亚洲文明都是蒙古的另一个遗产。

蒙古的遗产及科学艺术的传播

这样的旅行和贸易促进地理知识的增长,这是蒙古的另一大贡献。《元经世大典》中的一幅地图流传了下来,这幅地图涵盖的疆域比早先的中国版本更为完整,其中包括四个蒙古汗国以及延伸到伊斯法罕和大马士革等重要城市,并大致

准确地勾勒了欧亚大陆。旅行者们当然对这些知识作出了贡献,不过还有一个因素是,这一时期穆斯林抵达元大都(北京),也催生了一批专家,他们掌握了绘制更为精确的地图的技巧,并采用经纬度网格线,这都是吸纳自伊斯兰世界的理念。蒙古人还委托他们编写了一部皇家地理志——《元大一统志》,并制作了其他地图,不过没有保存下来。穆斯林地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为地理学知识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蒙古时代也增进了伊斯兰世界和欧洲对欧亚地理和地图制作的了解。波斯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卡兹维尼(Hamd Allāh Mustawfī al-Qazwīnī,约1281—1339)制作了相当复杂的世界地图,在地图里他绘制出海岸线,还在中心标出不同的气候。元朝的地图跟这幅地图非常相似,以至于有些历史地理学者猜测中国版地图可能以卡兹维尼的地图为蓝本,不过这一假设缺乏确凿的证据。更有甚者,欧洲有一本介绍从意大利到中国的路线的指南。弗朗切斯科·鲍尔迪尤卡奇·佩戈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约1280—1347后)是一个在伦敦、安特卫普和塞浦路斯工作过的佛罗伦萨商人,他从未踏上过丝绸

之路的旅程,但却为前往亚洲的旅行者写了一本手册。这本商业著作作为旅行者提供了有关产品和价目的精确而珍贵的信息——无疑是根据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提供的信息写成的。他甚至精确地写出了从中东到中国、从土耳其到伊尔汗国首都大不里士的距离和旅行所需的时间。最后,他还介绍了长距离商队所需的人员数量,途经地区的进出口产品、币值、不同的重量和长度单位,以及各个地区黄金和白银的质量。

“蒙古统治下的和平”创造了相对和平的局面,从中受益的不只是商人。来来往往的旅行者众多,包括士兵、医生、使节、神职人员、伶人、工匠、商人、王公贵族、天文学家、官员、翻译、火炮专家、文士、地理学家、厨师、学者、工程师和金融专家,他们在旅途中与各种不同的群体接触,从而促进了交融和往来。基督教使节和传教士曾前往蒙古人的故都哈喇和林,蒙古人迁都中国之后,他们又抵达了元大都。一些使者奉教皇或欧洲的君主之命,前来阻止蒙古进一步入侵欧洲,建立和平的关系,但也有一些使者来规劝蒙古人承认教皇的权威、皈依基督教,这反而导致与蒙古关系进一步疏远。蒙古人还招募波斯天文学家来中国,

并协助他们观察天文和星象、制订历法,最终由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完成了这部历法。为了促进医药知识的发展,他们招募的还有一批医生。蒙古人迫使工匠从他们领地的一处转移到另一处,以引入新的图案和技术。臣属国的士兵有时加入蒙古人,与他们一起旅行。在中亚和波斯的攻城战中,蒙古人得到了中原专家们的技术指导,穆斯林专家则为蒙古人与南宋的对抗提供了弩炮等帮助。

蒙古人对美丽物件的爱好给艺术带来了戏剧性的后果。他们将中国的纹饰和技术传播到了中东,推动了工艺领域的融合。中国用以象征皇帝和皇后的龙凤图案出现在了波斯的陶瓷和瓷砖上。宋朝山水画中的风景,包括对树和山的描绘,在诸如《王书》(Shahnameh)和拉施特(Rashid al-Din)的《史集》等波斯语手稿中都得到复制。波斯陶艺则仿制中国青瓷和随后的青花瓷。另一方面,因为蒙古人强制纺织工匠从所谓的“西域”迁徙到中国,中亚和波斯的纺织品也影响了中国。制作“纳石失”(nasij),一种蒙古人喜欢的金线织锦,掀起了纺织工匠

▶ (下转15版)

《庄子》之中诸多涉及先秦人物的记载都是“寓言”,所以全系凭空捏造,全然无足信据,这种观点目前在学界仍然会时常遇到,甚至有学者以此为“常识”并用之教导后学。实际上这种观点是20世纪初产生并广泛流传的对《庄子》文本的一种误读,其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三,下面一一分述。

寓言一词翻译时产生的误差

寓言(fable)是一种特殊的西方文学体裁,一般以比喻或拟人的故事寓意蕴深长的道理,其以《伊索寓言》最为典型。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至少有三个特点不可或缺:一是虚构性。寓言的内容和情节都是作者独具匠心的虚拟,没有事实或历史根据;二是人物具有性格,故事具有情节;三是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伊索寓言》传入中国之初其被翻译为《况义》,“况”即比况,“义”即寓意。在清代《伊索寓言》又被翻

译为《意拾蒙引》,其中使用“蒙”字无疑是因为翻译者看到了寓言对少年儿童的启蒙作用,而使用“引”字则很可能是因为寓言具有引人思考的意蕴。无论是“况义”还是“蒙引”,都说明前人已经注意到了寓言这种西方文学体裁的特殊性,在古代汉语中并没有与之严格对应的词汇。1902年林纾等翻译《伊索寓言》时首次使用了“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而沈德鸿(茅盾)先生则在1917年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寓言”一词与西文“fable”的对译关系。自此以“寓言”一词来翻译“fable”被正式认可,进而广泛流传开来。

但是,按照上文所列举的作为文学体裁的寓言所具有的三个特点来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fable”一词与《庄子》所说的“寓言”其实是不对等的:

《庄子》寓言的百年误读

张朋

第一,“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在《庄子·寓言》对“寓言”的描述性定义之中没有虚构假设的含义。因为人们都喜欢“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所以《庄子》书中除了直接地发表观点和议论之外,类似于亲生父亲不方便亲口夸奖自己的儿子而引述外人赞誉儿子话语的情况,庄子引用了他人话语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以求更好地说明意指。简单来说,就是引用他者话语申论己意,其中绝对没有伪造他人话语的含义。

第二,《庄子》中很多人物性格模糊,大多数记载缺乏情节或情节不完整。比如《逍遥游》中蜩与学鸠对大鹏的“扶摇直上九万里”发表了议论,其中仅仅是出于一般鸟雀的立场来表达对大鹏鸟的不理解以及对自己所处境遇的满足,蜩与学鸠的性格并不突出。

《庄子》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人物对话,根本就没有什么情节,比如孔子与老子的多次会面。

第三,哲学著作《庄子》中频频出现的人物对话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并不通俗易懂,也没有“鲜明的教育性或讽刺性”。即使因为《庄子》中的某些片段可以视作寓言故事甚至用于儿童教育,但是因为其具有深刻内涵而与一般的浅显易懂的寓言故事判然有别。

总之,把《庄子》寓言直接理解为“用假托的故事或者自然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常带有讽刺和劝诫的作用”绝对是不合适的,并不符合《庄子》文本。

对《史记》相关记载的误解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对

庄子的记载非常简略:

庄子者,……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箝》,以诋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

司马迁的这段话引发了司马承桢等学者的误解,其中的关键是:司马迁所说的“寓言”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司马迁所说的“寓言”是指伪造他人言论的话,那么接下来司马迁只是在举例论证他的判断,即列举了《庄子》中的部分篇章和内容并说明其别有用心之旨,揭示其捏造事实之处。所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看,《庄子》这本书全部是“假托之言”,其用意是“以诋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所出现的人物“皆空语无事实”。

《庄子·寓言》有“寓言十九,藉外论之”,意即《庄子》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藉外论之”的寓言,所以司马迁应该是据此做出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

▶ (下转15版)